

評論

莊雅仲，2014，《民主臺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89頁。

容邵武*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閱讀莊雅仲這本書的過程仿佛就與自己的成長經驗共振一般，它既書寫雅仲自博士論文階段開始大約15年研究臺灣民主化過程的歷史，它也記錄了所謂臺灣4、5年級生所度過的從戒嚴噤聲到今天人人有話要講的「大聲公眾」的年代。因此本書處處揉雜著個人生命史（當然還包括從生澀的博士研究生到追蹤觀察的大學教授的漫長個人研究參與歷程）。於是，當我熟悉的一些歷史片段被雅仲詳細記錄並且有意的重組在新的認識架構下，不但常常有散佚已久的記憶再次浮現的驚喜，並且更有種熟悉的個人經驗被「陌生化」的感覺，因而逼迫我重訪我的記憶並和雅仲所提出的認識架構對話。這個來回的自我和大社會對焦的過程，莫非一如臺灣這個島的跌跌撞撞的歷史過程：「民主化作為個人或群體長期的智識探索與行動實踐... 這些探索與實踐持續遭遇的衝突與矛盾」（莊雅仲 2014：3）？

也正因為如此，莊雅仲對（臺灣）民主的診斷與治療，就不是民主單線進化觀點下對民主進程的頌歌與悲嘆，對民主進程的高漲或衰落只著重在結構與行動的二元對立的解釋與期待。民主進程繁複多樣，有時如集結萬名群眾波瀾壯闊的凱達格蘭大道，但更多時候如同臺北永康社區綿密濃稠的彎彎曲曲小徑。「民主」不但沒有單一的樣態，它其實

* E-mail: swjung@ncnu.edu.tw
投稿日期：2015年1月8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5年3月23日
Date of Submission: January 8, 2015
Accepted Date: March 23, 2015

反而是一個社會文化政治交錯的結果。《民主臺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治》不是我們一般所熟知的臺灣民主化過程的大敘事，也就是只著重在政治行動者（特別是政黨）在其所面對的機會結構裡，所扮演的英雄或悲劇的角色；它反而引領讀者去深入而細密的去探索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現象，在社會運動中，在追尋族群的夢想下，或是在社區巡守、媽媽的談話裡，以檢視民主的「在地意義、流通論述、多重爭議和轉變的權力形式」（莊雅仲 2014：4）。雅仲之所以願意而且能夠探討微觀的政治過程，除了因為是人類學（或是「民主人類學」）特有的親身參與和近距離觀察的民族誌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不同的理論視角，「民主化一開始就無法是抽象概念強加的過程，二十世紀末開始的民主化，其實是一個跨領域的思想流動／行動的場域，試圖扳動這個『錯誤』工程，以及由此產生的連動效應」（2014：3）。我後文會再回到這點對我來說極具關鍵性的宣稱。

以下用莊雅仲自己的文字先簡述本書章節摘要。本書探討三類關鍵概念：分別是公共、本土與地方問題，分成九個章節裡，基本上一個概念均勻散佈在三個章節。第一部分關注公共性問題，檢視國家和市民社會辯證性的轉化過程中，新的公共空間如何形成。第一章分析人民主權以及新的憲政秩序成形，除了國家認同的持續爭議外，還有新社會力量的挑戰。第二章討論起自 1980 年代末期許多新成立的社會運動團體，1990 年後半開始，變成市民社會的重要組織力量，其組織策略、政治操作直接或間接形塑公共性的面貌。第三章描述所謂「大聲公眾」的形成史，這個政治熱情漫延在電視螢幕前、客廳或咖啡廳空間裡，構成一個無法抗拒而引人入勝的生活方式。

第二部分檢視臺灣的「本土」問題。第四章分析本土的一段智識發展史。第五章探討「本土」概念所帶來的認同政治，莊雅仲提出本土認

同，基本上是將個人和文化重新連接的過程，它迫使個人追問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到底要變成甚麼樣的狀態，這些追問牽涉道德的政治和經濟學。第六章探究認同政治的另外一面，也就是新的少數政治，族群成為多元文化表現的根源，而民主則提供了另類文化想像的舞臺。

第三部分分析民主的地方性問題，包括社區動員、地方政治與性別想像，這三章以臺北市一個地方鄰里研究為例。第七章首先檢視臺灣的地方動員，探討「社區」這個概念，及其對民主深化的影響。第八章描述都市鄰里地方政治，探討地方性的爭議，強調爭議必須放在一個追尋社區意義的脈絡來看。第九章檢討臺北市鄰里的媽媽網絡，探討一個新的女性組合，以及因此形成的「集體母性」問題。作者企圖以這社區三部曲了解都市社區的複雜與多重面向，以了解民主的空間意義與地方效應。

結論則回到臺海的戰爭與和平和民主的交互影響，新中國強大主權的形成過程中，臺灣內部政治成為新的戰線，而民主則成為最後一道防線，以及唯一的希望。

從以上各章節的摘要，就可以知道這本書涵蓋的主題範圍很廣，時間的尺度很長，空間上則從國家到鄰里巷弄皆有，甚至一般不會放在一起討論的主題，例如「集體母性」和族群之夢，作者將它們放在以上所述的三個支點，將其撐起來，互為參照，變成一個較廣的面。我以下的評論無法照顧到這些面向，我於是只放在二個論點上，因為我自己也做了些相關的研究。其一是市民社會，其二是國家和社區。

首先，作者對市民社會所持的立場很清楚的呈現在他對「大聲公眾」的分析。作者引用 Jacques Ranciere「不同意」的概念，論證諸如「大聲公眾」的現象，所產生的言語、修辭，包括了情感表達、言辭選擇、視覺象徵使用以及對聽者的特別關注等，構成了政治溝通過程中的

血肉，既是內容如何被傳達的過程，而且過程中的內容的意涵也受到影響，修辭因此使得講者和聽者能反思性地共同參與於政治對話過程（莊雅仲 2014：82）。這個在政治溝通的公共領域中強調修辭的重要性，就和主流的以 Jürgen Habermas 為代表的政治溝通的理論非常不同，Habermas 偏重理性的溝通過程，以建立一個具有互信並能達成共識的情理辯證模式。作者也指出國內學者李丁讚、吳介民已經注意到修辭在政治溝通的公共領域的角色：修辭將社會內部存在的情感、價值、利益和社會認同的矛盾或衝突，導向一個尋求共識的社會心理狀態。作者基於「不同意」的概念，固然同意李丁讚、吳介民注意修辭的重要性，卻認為我們必須放棄關注修辭乃為了形成共識的說法，否則不僅極易誤解大聲公眾內在不時出現的不馴與不合，更會忽略大聲公眾展期的另類公共概念，存在於這些另類公共性的是生活世界的多重交錯存在。一如作者所引用的 Nancy Fraser 的主張，無數庶民式的反抗式公共，在其中從屬社群發明並傳播反抗論述，因此得以發展有關認同、興趣與需求的反抗詮釋。大聲公眾是平行論述的交界空間，所謂的「政治化的日常生活」，衝突而非共識則是這些交錯的生活世界意義扞格的結果（莊雅仲 2014：83）。

我曾經研究過臺灣地方公共領域的問題。我也提出 Habermas 的理念型公共領域完全依賴（理性）的言說和溝通，然而這不是一個簡單自明的能力，許多論者已經指出這個模型的局限，進而探討諸如表演、身體、情感等表現形式建構公共空間的能力，例如 Foucault 提出了一個和 Habermas 迥然不同的主體和理性言說的預設。人類學家如 Alonso (2005) 所分析的墨西哥、Navaro-Yashin (2002) 描述的土耳其都提到當代主流對於公／私領域區分的假設阻礙了我們對於當地公共文化的了解，當地公共文化交織著對國家、族群、家庭的想像，既具保守性也有衝突的張

力。在 Ozyurek 所描述的土耳其公共展示裡，家庭私人的生活相簿被公開陳列，藉著觀者和相簿裡容易同理感受的親密性，發展出某種土耳其的集體公共性（2004: 107-108）。我因此認為「理性－批判的公共領域」在臺灣實踐必須被反思，我們要重省 Habermas 的政治現代性理論，包括主體和公／私領域的關係、公民社會，都太過於歐洲中心論。人類學所致力非西方國家的研究如 Shein (1999) 描述中國苗族日常生活的自我展演，是一種和加諸在他們身上各種範疇——例如少數民族、「苗族」、進步的現代、落後的文化——的協商和互動的行為。在展演的過程中，在日常生活裡，各種範疇被拆解或重組，傳統與現代的界線被多樣的行為並置和呈現。所以如同莊雅仲的取徑，我們要探討公共性的「實質」而不是應然的面向，也就是注重了解人們經驗自我和集體的方式，而且這些方式是深深根植於他們的在地文化裡。

其次，國家和社區。「社區」概念在 1990 年代中期受到各界特別重視，行政院文建會（今文化部）主導的社區營造成為醒目的公眾議題。當然學界對此有所探討，本書整理了古典理論中特別是對於都市研究的取向：都市社會學認為高密度、高感度與高異質性的都市生活方式，造成個人主義與可能的心理迷失與社會失序。都市人類學則主要針對新移民的生活適應，社區只被看作是抵禦都市疏離感的避風港，社區被描繪成相對封閉與強調面對面關係的同質空間。近年來的理論發展則提供超越都市和社區的二元對立，同時具有行動意義的都市社區的研究。一方面，有學者認為，地方只是資本主義同質化力量威脅下的鄉愁對象，或甚至是反動排外的藉口；另一方面，有學者則認為地方的特殊性可從一個動態、開放與衝突的過程中獲得，任何一個地方都是內外關係的一個特殊混合體，形成了地方的活力（莊雅仲 2014: 164）。作者因而主張，「社區」可以做為新社會運動的標的，不應只是本質性的顯現或只是鄉

愁性的感動，社區毋寧是一個經驗性的刺激，加上文化元素與個人和社會記憶的結合。社區意識不只是防衛式的反射動作，它應該看作是一個未來藍圖，以解決處理當前的困難與爭議（2014：169-170）。作者的永康街三部曲即在顯現社區的多邊動態關係，注意社區各種可能的場域、組織、人物、角色等等，當然作者也沒有忘記社區所處的從全球到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的因素。

社區總體營造必須正視文化面向的討論，所謂回到鄉愁某種同質文化的狀況。論者指出幾個大的面向，例如，文化元素客觀化、「真實的」與「虛構的」（*spurious*）文化的爭鬥、文化與社群身份的確認、全球化和觀光化的潮流之下，當代文化朝向可展示、可造訪性（*visitability*）的方向生產等等。然而這個過程不單純只是在社區公共場域展示熟悉的文化傳統，它展現的是結構性的鄉愁（*structural nostalgia*）（Herzfeld 1997: 109-114），人們以逝去的從前接合走向現在和未來的敘事，借助原初（*primordial*）的特質，把從前和現在所從事的社會行為本質化為文化的連續性。而這種結構性的鄉愁，Herzfeld 既是對內也是對外的防衛與行動。作者所舉的例子，正是典型的屬於本土特質的行為，卻連接到「現代」以及全球化的公共空間裡。也就是說，當地的社會行動其實是緊緊扣連著當地原有的文化脈絡和認同內涵，回應著莊雅仲所說：「社區毋寧是一個經驗性的刺激，加上文化元素與個人和社會記憶的結合」。因此我認為我們要仔細看看 50 年來國家所實行的一系列都市建設、都市政策，在社區成立了那些官方和半官方的組織（里辦公室、巡守隊、媽媽教室，以及社區理事會）。我們同時要注意是那些人參與，實行的情況為何，社區居民對這些建設方案、這些組織的觀感為何，如同莊雅仲書中的陳述。我認為，有了這些歷史過程的了解，我們才可以分析當地居民的地方世界裡，如何把國家、國家社區政策、以及它們背

後所要建構的現代理念如公共領域、社區未來願景等，放置在他們的文化範疇裡。

總之，雅仲的文筆流暢，描述現象時生靈活現，尤其當寫到和個人歷程有關或是對臺灣的現在與未來有所針砭的時候，常有許多詩意般的隱喻，閱讀時候頗多驚奇，發人省思。若是雅仲能夠再有一部分專節於導論中，提綱挈領地把他散見在九個章節裡處理不同主題與研究對象時所運用的各種理論與論述統合起來，給讀者像是藍圖般的引介，讓讀者讀完全書之後，有著清楚的理論對話與結論，那麼讀者當更能體會本書的三類關鍵概念：公共、本土與地方問題，該如何繼續自己的理論探索。畢竟，如同 Arif Dirlik 在書本背後封面所寫的推薦詞：「本書不僅是臺灣學者和讀者的架上之選，對有志於中國及東亞民主研究和兩岸關係研究的學者以及社會運動人士而言，也是不可錯過的一本佳著」。我將進一步說，本書不只是個案研究而已，還可以讓我們對於民主、社會運動、社區等理論有著人類學式的反省。

參考文獻

- Alonso, Ana Maria, 2005, "Territorializing the Nation and 'Integrating the India': 'Mestizaje' in Mexican Official Discourses and Public Culture." Pp.39-60 in *Sovereign Bodies: Citizen, Migrants and States in the Postcolonial World*, edited by Thomas Blom Hansen & Finn Stepputa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erzfeld, Michael, 1997, *Cultural Intimacy: Social Poetics in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Routledge.
- Navaro-Yashin, Yael, 2002, *Faces of the State: Secularism and Public Life in Turk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Ozyurek, Esra, 2004, "Wedded to the Republic: Public Intellectuals and Intimacy-Oriented Publics in Turkey." Pp.101-130 in *Off Stage/ On Display: Intimacy and Ethnography in the Age of Public Culture*, edited by Andrew Shryock.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